ORIENTAL STUDIES AT ZJSU

VOL.1

东方研究集刊

（第一辑）

王宝平 主 编

江 静
董 科 副主编

融合（Fusion）——围绕韩国文化之假说

近代中日笔谈文献之瑰宝——《大河内文书》前言

汪康年致山本宪书札考注

梅·齐娅黛散文语言风格研究

宋风石刻东传日本与东亚海域交流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ORIENTAL STUDIES AT ZJSU

VOL.1

东方研究集刊

（第一辑）

王宝平 主 编

江 静
董 科 副主编

浙江工商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研究集刊．第一辑 / 王宝平主编．—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178-2131-1

Ⅰ．①东… Ⅱ．①王… Ⅲ．①东方学－文集 Ⅳ．①K1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0240 号

东方研究集刊（第一辑）

王宝平　主编　江　静　董　科　副主编

责任编辑　姚　媛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jgsupress@163.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　　版　Bryanz
印　　刷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57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131-1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本书为以下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浙江省“十三五”A 类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

浙江省“十三五”特色专业建设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日语专业）

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培育基地项目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委会

主　　办：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主　　编：王宝平

副 主 编：江　静　董　科

编　　委：王宝平　江　静　吕顺长　吴　玲
肖　平　郭万平　董　科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辑助理：李　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

文 化

融合（Fusion）
——围绕韩国文化之假说　中西进　/ 002
从植物重花物候看古代中韩文化交流
——兼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质　董科　/ 010
高丽贡女奇皇后与元代的汉文化　胡倩茹　/ 026
新罗“花郎”和萨摩“兵儿二才”
——“年序组”习俗之日韩比较　山田直巳　/ 037
宋风石刻东传日本与东亚海域交流　郭万平 孔媛　/ 047
日中妖怪比较研究之可能性及课题
——以鬼、天狗、河童为例　今井秀和　/ 057
复仇与义杀
——中国法在近世日本的作用　岛善高　/ 069
近代中日笔谈文献之瑰宝
——《大河内文书》前言　王宝平　/ 079
汪康年致山本宪书札考注　吕顺长　/ 098

文 学

佚存日本的《唐人送别诗并尺牍》辑考　吴玲　/ 118
苏轼与李奎报的佛教诗比较研究
——以《楞严经》的接受为中心　李燕　/ 130
敦煌本《燕子赋》与朝鲜时代“鸟类”讼事小说的
关系研究　吴晓丽　/ 161

中国古代典籍在朝鲜的传播
——以金奭準选编的《湖海诗钞》为例　刘婧　/ 171
郭沫若抗战史剧简析
——以创作特征及政治理念为中心　尹虎 佟波　/ 182
梅·齐娅黛散文语言风格研究　归帆　/ 194
《宰赫拉的故事》叙事视角中的女性权威建构　张羽　/ 209

语　言

现代日语中「すみません」的含义
——从“配虑（关怀）表现”观点分析　木村义之　/ 218
日语会话中倾听者在单线参与结构故事讲述中的作用
——以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例　张惠芳 张冰颖　/ 234
丰子恺的日语学习法　孔颖　/ 250
日本明治时期翻译文化及二叶亭四迷对鲁迅直译观的影响　陈红　/ 260
巴利语中的“所立提示”表现
——以《梵天招待经》用例为线索　耀文（肖平）　/ 271
浙江工商大学特色的中阿翻译教学　周玲　/ 280

后　记　/ 290

《东方研究集刊》稿约　/ 293

文化

CULTURE

融合（Fusion）
——围绕韩国文化之假说

中西进[1]
（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　奈良：634-0103）

摘　要：本文探索韩国文化具有融合之特点，认为韩国位居半岛，一方面承袭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另一方面具有陆海参半的特点，它通过超越冲突、融合文明的和平方式，将大陆型的异质文化传播到了海洋型文化圈，让日本在亚洲文化中诞生了丰富的情感力。

关键词：韩国文化；半岛文化；融合

一

公元前 1500 年左右，中国殷商文明（Yin civilization）繁荣璀璨之时，印度的印度河文明亦灿然花开，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而且印度的释迦牟尼于公元前 566 年（一说为公元前 483 年）出生，中国的哲人孔子也于公元前 551 年诞生，这难道是偶然吗？

实际上类似的例子远不止这一两个。由此看来，地球的巨大呼吸在各个地方产生了同样的现象。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地呼吸（Earth breathing）”。

刚才我说的是亚洲的“大地呼吸”，这一呼吸毫无疑问催生了亚洲文化的两大发源地。不仅如此，其生成的文化在各地域发展，具有了这些文化所在地域固有的性质，恐怕这也是“大地呼吸”作用的结果。

关于如此诞生的亚洲文化，我曾写过一些论文，我认为各地域因始终呼吸着的大地之性质而有着极其显著的文化力量。

原本印度就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在此背景下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文化想象力。比如古老的《梨俱吠陀》就记述着佛教所描绘的森罗万象。

而且这一印象被很多人认可，中国学者宋云彬也说受“佛教文学最具想象力”的影响，中国的“想象力自然变得丰富了”。（宋云彬等著，小田岳夫、吉田严邨译：《中国文学史》，创元社 1953 年版，第 64 页）

另一方面中国的农田绵延千里，其广袤达到农夫从地平线出现又于地平线

〔1〕中西进，奈良县立万叶文化馆名誉馆长。

消失的程度，而尽头便是面迎沙漠的黄土大地。

这伟大的土地却充满着荒芜之力，不允许人们来依赖。这就势必孕育出充分反映人之智慧，依存于伦理秩序的文化。清康熙帝钦定文字辞典一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我暂且把它称为“文化的论理之力”。

相反，海洋国家日本受惠于自然，受潮风吹拂，富于情感，它尊崇感性，“物哀”之情相生，擅长洞察诗意。因此在日本能见到“文化的情感之力”（亦称感伤之力）。

当然，国境并不能完全决定文化的发展。比如华南的三星堆文化尽管在典籍上与《山海经》等为同一风格，但却不同于说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的华北孔子的思想，倒不如说其属于印度圈的想象力文化。

二

在这样的亚洲文化中，韩国文化是以怎样的文化力量参与亚洲文化形成史的？关于此话题，我认为以下三点是格外重要的。

第一点，韩国独特的半岛位置。

半岛国家既能产生也能接受大陆型文化和海洋型文化，于是两种类型的文化或单独存在，或融合为一体而存在。前者或分地域并存，或各自有不同的种类；后者或在这一地域产生新的独特的文化，或是产生“四不像”的文化。

在半岛这一并不纯粹的地域上的文化，一步之差就会令暧昧不清的特色贯穿始终，这一点在亚洲整体文化形成史上也有体现。韩国文化的丰饶令人期待之余，也有详细考察的必要，其在文化成熟中应成为极其重要的考察对象。

关于此点，我将在后文陈述鄙见。

第二点，朝鲜半岛的背后是草原。

古代中国是以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所裹挟的地带为中心建立国家的，通常与北方蒙古诸民族划界而治。

作为农耕民族的汉族进入北方，将草地化为耕地，这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无疑是对他们所珍视的草原的破坏。

然而汉族所建立的中国王朝在元、清两朝也不得不承认北方民族的帝王，但尽管如此，不能将华北草原与中原、华南一并作为伦理的产生之地。

那么，应该怎样把草原文化加入亚洲文化中去呢？如此想来，北方蒙古尚有太多不为人所知的文化，以游牧为主的人们写在羊皮上的文字存世不多。我们只能期待着今后的研究取得新进展。在这里，我斗胆推测：北方草原性的文化之力保存在韩国文化之中。

平凡社 2006 年出版『韓国歴史地図』（《韩国历史地图》）一书，据其东亚民族分布图所示，亚洲一带的黄色人种分为南、北两部分，两者区分明显。如从决定基因的 Y 染色体方面来看，南北之分更加明了，日本与韩国一体，位于北方，而北亚一带却鲜有文化发展的痕迹。

因此或许可以推测，将此重担肩负起来的是不是韩国呢？韩国文化中是否还留存着对抗他方文化的草原性文化之力？

实际上五、六世纪的高句丽与北方的突厥和中国的北魏王朝都建有外交关系，而且高句丽还向日本派遣过使节。

在中亚撒马尔罕的古坟壁画中发现了七世纪高句丽的使者画像。他们或许是经亚洲北方和草原之路往返的。

原本朝鲜半岛居民祖先的一部分就曾居住在现今中国的东北地区。不仅是高句丽，百济也“百济国之先祖自夫余出”（《魏书・百济传》），百济王室以余为姓，大概是源自其先祖居住地夫余吧。

而且百济在中国晋朝时已据有“辽西、晋平二郡”（《通典》），由此可知如今渤海湾沿岸地区就是其领地。

如此看来，半岛型韩国文化历史实际上远非历史所载那么久远。无论是高句丽还是百济，原本就是生活在如今中国东北地区而自立王国，他们在保持原有特性的同时，逐渐变成了半岛人。而且应该也继续保持着草原型文化之力。

再者，百济灭亡后渤海国意图将旧百济、旧高句丽曾经所有的半岛与大陆交界处据为己有。夫余府就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

看起来渤海国好像继承了四世纪高句丽领土的“DNA”。然而，到了十世纪诞生了统一全岛的高丽国，自此决定了半岛型文化的产生。

只是其中仍留有华北草原的文化和血统，由此我假设这种草原——半岛型韩国文化存在于亚洲文化史中。

第三点，韩国在亚洲文化史河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也就是说，把印度的想象力和亚洲文化的论理传至日本，让日本在亚洲文化中诞生了情感力。这种情况我将它比作河口的作用来进一步阐述。

比如在海水中长大的鲑鱼，为了产卵沿淡水河逆流而上，途中需要有淡水和海水混合的水域，像这样不同性质的东西能相互交流。淡水、海水交汇区域的水被称为“汽水”。“汽水”不仅对鲑鱼重要，对同样往返于河流海洋的香鱼、鳗鱼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

朝鲜半岛这一极其重要的“汽水”在文化传播流通中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因为拥有陆海参半这一性质，故将大陆型的异质文化传播到了海洋型文化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三

那么历史上韩国文化是怎样传播到日本的呢?

实际上文化的传播与吸收并没有那么简单。

比如一世纪左右，中国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当时关于灵魂不灭论曾引起激烈争辩。日本虽也有过著名的苏我氏与物部氏（即佛教与神道）之争论，但其中朝鲜半岛一旦排斥佛教，就不会有佛教流入日本了，而且将佛教传往日本是圣明王之志愿。

概观地球上文明之流变，可发现以下三点。这三点我已在《对话时代——从冲突到超越》(《公明新闻》2002 年 1 月 1 日）叙述过，即第一点，文明之地域侵犯；第二点，文明之冲突；第三点，文明之融合。

十八世纪，欧美文明侵入亚洲、非洲各地，像这样的“文明”与“野蛮”的架构时至今日也已烟消云灭了吧，“侵入也已不复存在”。

如今还多有发生的是冲突。一时间，美国人亨廷顿所著的『文明の衝突』(《文明的冲突》)（集英社）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不但如此，现如今，彼此只认可自身价值而不相让的冲突始终在全世界继续着。

但是，令人安心的是文化有着回避文明冲突的力量。这正是第三点文明具有融合的文化力量。详见《公明新闻》拙文。

历史上韩国向日本传授文化正是通过超越冲突、融合文明来实现的。

这一对话在异质文明被赐予之时，是可以靠靠尊敬他者的文化力量实现的。在此之上还有对自国文化的自信，据此才能将异质文明的长处与自国文明相融合，才能在自国疆域上产生新的美好事物。

在草原和半岛所孕育的文化中，我们期待这样的融合力。

所谓融合就是要创造出一个自身固有的领域。

我在《公明新闻》写过一篇小文，叙述何谓“融合”。它就是尊重事物共性的精神，尊重内心的细腻。还写有如今是爵士融合音乐、比利时物理学家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与远离非平衡态被重视的时代。融合力也极具现代感。

我以前曾在挪威见到一座建于十二世纪基督教兴盛期的木条教堂。那是一座用不同种类的木材作为瓦片，层层叠叠如鱼鳞般的建筑，是一座与维京文化融合的基督教堂。

一种被称为“爱尔兰十字”的圆形与十字架结合的图案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墓地都能发现，这也是融合的文化的体现。

在此，我有必要说一下关于我所讲的“融合力”的定义。这是因为今天有时用 fusion 一词指代原子核融合，但是我的定义不是如此细分化的“fusion”，而是指能让佛教所说的极其细微的原子核融合、能与拥有巨大能量的他者进行

合一。笔者将它作为理想，作为融合力的定义。

四

关于韩国文化的融合主义，在这里我举两个实例。

第一，乡歌。

众所周知,《三国遗事》（卷二）中载有处容歌的故事。由宪康大王（875—886 在位）赐婚的处容于月明之夜回家后，发现妻子床上有四只脚。于是处容唱道："东京明月夜，贪遊至晚归。进房寻妻子，床上足两对。两只属妻子，余足当为谁。此处应为我，予夺当何为。"谁知另外两只脚是瘟神的，瘟神见状坦言道："你不怪罪我，我甚是感激，今后，凡悬挂你头像之门，我定当不入。"

以后，人们便在门上张贴处容画像以祛除瘟病。

像这样祛凶就吉的传说还有苏民的故事。传说武塔天神为报答借宿一晚之恩情，施以特制避邪之物救得苏民家女儿一命，但把其他人都杀掉了。这是一个残忍的神话。

而且日本《万叶集》（卷十一）所记处容物语的一节，歌词如下所示：

長谷の　斎槻が下に　わが隠せる妻　茜さし　照れる月夜に　人見てむかも（2353）

大夫の　思ひ乱れて　隠せるその妻　天地に　通り照るとも　顕れめやも（2354）

随之我想到的是从韩国渡来日本的民众所唱的乡歌中的两首歌：第一首，大概内容是"其他男子冒犯了我的妻子而心存顾忌"；第二首的内容是"没有这样的事而奇怪地抗议月明之夜"。

两首歌很相似，但是处容歌肯定是有误的。

处容为何保持沉默？为何不责备那个男子？如果他只是一味惧怕瘟神，他到底在纠结什么？对于处容的沉默之举我曾陷入沉思，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场合下，一般的做法应该是处容发怒并斥退瘟神才对，复仇才是常识。

日本有一部大型复仇剧《忠臣藏》，受到人们追捧，并成为歌舞伎中叫座的剧目，时至 500 年后的今天仍人气不减。

《忠臣藏》讲的是一位叫浅野内匠头的大名，心眼儿很坏，后被吉良上野

介斩杀。而浅野的 47 名武士部下为了给浅野报仇雪恨，冲进吉良家讨伐并取其人头。这是双重复仇，复仇没有尽头，但是世间却以“忠义”赞许复仇。

从这个例子来看，处容的文化素养还是很高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窥见宽容之美德。

再者，这种生活方式是超越善与恶、邪与正这种单纯二元论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众多宗教或道德中所讲的中庸精神差不多。

融合就是一种中庸，而且宽容性和中庸与精神有深切关联。

作为第三者的天神判官为绝对支持者讲话早就在乡歌中出现了。《三国遗事》中就有如此描述：“时神现行，跪于前曰，吾羡公之妻，今犯之矣，公不见怒，感而美之。”男子现出瘟神原形，反而向人类下跪，并坦白了他犯下的错误，同时也表示自己原先也有像人类那样的感情。但是处容没有生气，瘟神很感动并赞颂处容。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神也怀有如俗恶凡人那般的情欲与迷恋女色的事实，而凡人却以宽容的精神原谅了天神的行为，通篇充满了感动与赞美之情。

这种充满隐喻的故事是另一种文化论。一方面，前文列举了日本武塔天神先报恩的例子。当然，实例中贴着的是誓死报仇的标签。另一方面，《万叶集》中的那两首歌词，仅是诉说沉入恋爱剧生活的一部分，窥不到伦理感的存在。

先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边，韩国的优秀文艺在讲述什么，我们能深刻理解吗？乡歌在韩国“能窥见那个时代人们的高度的精神世界”（大槻健他邦译，韩国国定教科书《韩国的世界》，明石书店，第 117 页）。同时赏月习俗被认为来源于蒙古，这点也非常重要。

在韩国，月明之夜舞动的圆圈舞很有名，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对明月的态度，一方面是忌讳，一方面又爱重月之清辉，在此背景下歌唱爱恋（拙稿《东亚文学中的乡歌》，选自中西进、辰巳正明编《乡歌——注解与研究》，新典社 2008 年版）。

这种赏月习俗被证明起源于蒙古草原。夜晚，月光洒在摇动着的芳草上，对月光的畏惧深深扎根在夫余人心里，通过乡歌歌唱者的演绎而成为圆圈舞这一形式。

这不是由黄土的大陆性产生，也不是由海洋性带着的岛屿性产生，会不会属于草原性？摇摆不定的融合性的一部分会不会就是自草原性诞生的呢？

于是有人提出了韩国文学的“恨之文学性”，就像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关于杨贵妃之悲剧的《长恨歌》，我认为韩国文学的“恨”与之同属一个范畴。

或许还可以把“恨”当作一种感伤来理解。

说起感伤，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三木清曾说“感伤是固有情念之入口亦是出口”（《人生论记事》，创元社 1951 年版），比如愤怒、绝望、欢喜这些固有

领域的情念，而感伤则没有这样的领域。无论怎样心都沉静不下来，有点在意的事就不开心，不久之后当对象及详情变得明了就会出现激怒或欢喜，但同时也更倾向于感伤，情念就这样慢慢消失了，这就是三木所揭示出来的。

我认为，这与其叫作感伤，更应该称为融合。融合与恨，意思几乎一样。

第二，佛像。

图 1 是今年（2016）6 月 21 日至 7 月 10 日于东京国立博物院举办的“微笑的佛”展所陈列的两尊佛像。韩国中央博物馆的半跏思惟佛像（国宝七八号）与以前的北魏样式相比缺少严谨与锐意。其衣装更加简略化，宝冠和发饰倒还精致，胸口还有仿制的璎珞纹样；下半身着装是波纹扩散样同心圆式深雕，有均整之美，像是莲台的东西仅仅有一部分。

图 1

如此，这一座立身状佛像已经不能有比这种形象更胜一筹的样式了，但还是透着丰富，抚慰人心。

佛像的面部轮廓丰满，大概是吸收了峻厉的北魏样式后才形成了这种柔和，然而这种柔和不正是象征着韩国文化的宽容与融合的细腻吗？

再看日本的半跏思惟像，这是一尊颇有名气的佛像。有人说佛像上用钉所固定的饰物已经遗失了，与现在相比原物能毫无保留地展示其特征。这尊佛像比韩国那尊还要简单、朴素，头无宝冠，仅有双髻。上半身无衣装纹样，也没有任何饰物。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沿着双肩呈波浪状流下来的垂发。佛像的姿态像是从水中刚刚升起，纯粹、恬静、幽雅、素直。下半身着装的下摆有跃动感、立体感，活灵活现。

将这尊日本佛像恢复为原来的北魏佛像或韩国佛像是困难的。但是，这尊日本佛像虽没有韩国佛像的安稳和丰富，其面容却清晰表现出佛之深思。

那么，这尊韩国佛像是不是为了 56 亿 7000 万生灵结半跏而坐呢？佛像左手轻轻搭在盘起的脚踝上，左脚趾尖浮起离开地面，处于深思状的韩国佛像在其沉静的外表下，如实显示着下济苍生的重大职责。

或许正因如此，韩国佛像才如此沉重吧。上体屈弯，所以外张右肘以手托腮，陷入深深的冥想。而日本佛像则脊背笔挺，右肘趋近上体，手从前面触腮。以上仅仅比较两尊日韩佛像，就能明显地看出韩国佛像身上的融合性，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日本佛像的朴素性。但它们都与北魏佛像的严格性相距甚远。

五

可以说韩国文化的融合力是在经历了亚洲文化之旅——从大陆文化的严格性到岛屿文化的朴素性之后，才得以形成的。

今后，不仅在亚洲，而是在整个地球文明中，我们所追求的人类福祉也将产生于文明间的对话与超越，产生于这种融合力。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光辉译，吕顺长校译）

（本文为 2016 年 8 月 7 日在韩国中央大学校举行的第 13 届东亚比较文化国际会议上的基调演讲稿。）

Fusion：Some Assumptions Around Korean Culture

NANANISHI Susumu

(Nara Prefecture Complex of Man'yo Culture, Nara: 634-0103)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ion of Korean culture. And it holds opinion, on the one hand, Korea inherits the Chinese northern grassland cultur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posse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land and sea,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in a peninsula. It spreads heterogeneous culture to the marine culture circle beyond conflicts and via a peaceful approach of cultural fusion, so that Japan generates a rich emotional force among Asian cultures.

Key words: Korean Culture；Peninsula Culture；Fusion

从植物重花物候看古代中韩文化交流〔1〕
——兼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特质

董　科〔2〕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杭州：310018）

摘　要：春季开花的植物在秋冬季节重新开花是由特定气象气候条件造成的物候现象，它在东亚各地普遍存在。以史籍中搜集的朝鲜半岛的67条植物重花记录为例，笔者在研究其气象气候成因、季节分布以及朝鲜半岛居民的重花观后发现，朝鲜半岛的重花记录的气候成因及季节分布都与中国及日本有极高的相似性。朝鲜半岛居民将重花视作灾异的看法也源于中国汉代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思想。物候气候的相似性是古代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传播和被接受的一大推动因素。

关键词：朝鲜半岛；物候；植物重花；天人感应；阴阳灾异

一、前言

植物重花，指一般情况下春季开花，夏秋季节结果的植物在当年秋冬或次年早春季节再次开花乃至坐果的物候现象，它由特定的异常气象气候条件形成，在受东亚季风影响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

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中国古代农耕文明注意到了重花与气候异常之间的因果关系，汉代以后，人们便将其视为天人感应造成的灾异之一，并作为政务的一环进行处理，将之记录于史书中。随着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这种对植物重花的看法及处理方式也被日本、朝鲜半岛等国家和地区的执政者接受，他们模仿中国的做法，将发生在自己国家的植物重花看作一种阴阳灾异记录在案，并就此做出相应的对策。

正因为植物重花在承载特定的气象气候的同时，又反映了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传播历程的一个侧面，所以研究东亚各国历史上的植物重花，不仅可以为还原历史上的气象气候提供参考，也可以为研究以汉字汉语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的传播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笔者已系统整理、研究了日本近代以前的重花记录发生的规律及其所反映的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1] 本文旨在研究朝鲜半岛的重花情况、发生规律及其

〔1〕本论文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4NDJC147YB）的成果。
〔2〕董科，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